

導 言

巫仁恕*

西元 1500 年至 1800 年之間，西方史學者稱之為「前現代」(pre-modern)、「前工業化」(pre-industrial)或「傳統」(traditional)時期，而最常用的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一詞。西方史學界關於近代早期的研究，提出此時期有許多重要的發展造就現代世界的形成，如資本主義與中產階級的興起、現代觀念的形成，以及世俗化、理性化與工業化的歷程。此外，西方研究這段時期的歷史學家經常在理論與觀念方面，扮演創發和跨學科整合的馬前卒。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0 年代中，隨著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傅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著作問世，此時期的歷史研究逐漸蘊釀一波「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的趨勢，即朝向文化史的研究發展。

反觀中國社會史的研究，這段時期約當明朝中葉正德至清朝乾隆年間，西方漢學家稱之為中國「帝制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過去五十年中，中外學界產生過一些重要的經典作品，如何炳棣研究人口與社會流動，張仲禮、蕭公權與日本學界關於士紳社會的研究，李文治等大陸學者探討民眾叛亂的著作等，這些都是我們對明清社會認識的基石。近十多年來，西方的明清史研究也受到主流學術的影響，「文化轉向」的研究趨勢甚為明顯，相關的研究陸續出版。代表性著作，例如綜論明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有 Timothy Brook 的 *The*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有學者形容他們是處在歷史學研究中的「利鋒」(cutting edge)。參見 Garthine Walker, ed., *Writing Early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Hodder Arnold, 2005), pp. xi-xii.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1998)；研究明代文人物質文化的專著，以 Craig Clunas 的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1)最爲著名；Susan Naquin 鑽研北京城市的宗教文化與日常生活，著有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2000)；Benjamin A. Elman 的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0)，探討科舉制度對文化的影響；城市文化的研究方面，如 Tobie Meyer-Fong 的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2003)，探討清初揚州的文化史。至於性別與婦女史、出版文化史，更是大熱門的研究領域，專著更形豐富。

然而，國內史學界對社會史朝「文化轉向」的研究趨勢，反應較爲緩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觀念上自我設限，認爲上述的課題瑣屑沒有意義；一方面則是對史料的定義過於狹隘，而兩者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觀念上的劃地自限，自然會讓我們對某些類別的史料有意或無意的予以貶抑、疏忽；而資料的限制，又使我們認爲中國人沒有上述的問題，或資料不足，無法研究上述的問題。²

中央研究院 90 年度通過歷史語言研究所申請之主題研究計畫「明清的社會與生活」，主持人爲王汎森與李孝悌兩位教授，而共同主持人除筆者之外，還包括劉錚雲、賴惠敏、胡曉真、王鴻泰、王正華、邱仲麟與陳熙遠等多位學者。由民國 90 年開始，執行 3 年期的研究計畫。該主題計畫聚集了一批海內外的歷史學者、藝術史家和文學史研究者，曾分別以中國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江南爲題，持續地進行團隊研究，累積了相當的成果。文化史的研究至此可說是蔚爲風氣，一個新的研究次領域也大體成形。

本刊專號諸文中，除邱仲麟之論文是在民國 91 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合辦，「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

² 有關近年來明清文化史的發展與反省，參見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收入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頁 1-35。

學術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外，其他論文則係該主題計畫於民國 92 年 12 月，假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過眼繁華：明清江南的生活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部份成果。各篇都是從新的角度出發，探析明清社會與生活史，或是對舊問題提出新的解釋。在史料的利用上，各篇論文皆嘗試突破舊有社會史研究的範疇，致力從新的史料中或舊有被忽視的史料中，找尋新的脈動。除了筆記小說與方志等史料之外，過去被視為文學作品的遊記與詩序，被視為財政經濟史料的內務府檔案，以及圖像類的城市風俗圖等，都在學者的巧思之下，重新被發掘出新的歷史意義。以下是對各篇論文所作的摘述。

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試圖在「文學史」的書寫方式之外，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考察「文人文化」發展的整體社會文化情境。他藉由士人與詩歌的關係，勾勒明代「文人」的形成與形象，指出明代士人在以科舉為主要目的之學習歷程中，詩的誦習與詩的感性特質，容易和年少士人的善感心情相呼應，乃致使部份士人徘徊於學業與詩情之間，進而走向「文人」之途。再者，明中葉以來科舉之途的坎坷，又激發士人轉向詩歌寫作，以文藝為生命活動的重心，而全然認同「文人」之社會身分。在社會層面上，詩的寫作及其相關的活動，也可以產生開發出極為繁複的社會活動，作者舉出詩文結社的例子，說明當時的現實社會中所營造出獨特的「文藝社會」，從中生產出「聲名」之社會價值，而投入其中之文人乃據此重新尋獲個人的社會定位。

邱仲麟〈天然冰與明清北京的社會生活〉一文，所欲探討的是天然冰如何透過政治體制、商業機制，與北京的日常生活發生連繫。明清兩代都有設窖藏冰的制度，清代北京官窖所藏的冰塊，最多時在 2 萬公噸以上，少者亦有 9 千公噸，而在城外也有民營的冰窖。康、雍年間，當官藏冰塊不敷使用時，官府會向民營冰窖採買；而自乾隆 8 年(1743)起，官方還將 1 萬餘公噸的窖藏冰塊販售至市場上。如此官民互通有無的機制，使得冰塊的供應穩定，也讓價格的波動不致太大。明清北京官方所藏的冰塊，主要為配合祭祀時供品保鮮之

需，以及宮中皇室膳食及解暑之用。但夏日也賜予官員冰塊，朝會時也設冰湯給官員解渴。由於朝廷有賜冰的制度，因此京官在夏天多以冰塊來消暑；而即使不是官宦人家，同樣也可以購冰放在冰盆上以降低室內的溫度。另外，冰塊與冰窖也廣泛地被利用在冷藏魚蝦、肉類與水果等等，至於夏日吃冰鎮酸梅湯，更是北京的一大享受。

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的論文主旨，是運用乾隆朝的城市圖像，來討論中央政權、蘇州地方政府與蘇州民間如何共同形塑蘇州形象與地景。乾隆朝有關蘇州的城市圖，特別是《盛世滋生圖》與《南巡盛典》，呈現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標式」構圖，這種描繪方式和蘇州繪畫傳統較無關聯，可說是一種新的嘗試，也製造新的地景。這個製造的過程是因為乾隆南巡時所經過的地景，由宮廷畫家留下畫稿；而地方政府亦竭力收集與南巡相關的圖像，彙整出符合皇帝意願的地景，再經皇帝寫序等背書的行為，形成一循環，並且與蘇州民間版畫中的蘇州地景相互吻合，皇帝的印記遂深入人心。

賴惠敏〈寡人好貨：乾隆帝與姑蘇繁華〉一文，由蘇州織造局著手，探討乾隆透過對織造局成做器物來看乾隆皇帝的喜好；進而探討乾隆皇帝影響江南消費文化的發展，以及促進蘇州的城市繁榮。乾隆皇帝每年撥給蘇州織造局成做綢緞、器物的經費，年約 10 萬兩，因而蘇州織造局實質地影響了江南手工藝的發展。不僅如此，蘇州織造局還兼營行銷人參、綢緞、玉石、毛皮等宮廷物資。蘇州製造業的發達也吸引了各地的官員到此採購貢品，或有投資製造業，或進行長程貿易，或開設店舖，蘇州城市的繁榮即奠基於此。她還指出過去大家都只注意揚州鹽商和廣州行商的生活奢華，然而蘇州消費能力並不亞於揚州、廣州兩地。

拙文〈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嘗試由三個角度，來探討明清兩代的文化是否連續或是斷裂的問題。首先，從旅遊文化史的角度來分析，晚明時在士大夫階層中達到空前高峰的旅遊風氣與文化，從明

清之際到清初這段期間，由衰退走向再興的過程，可見清廷入關並沒有完全阻礙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發展。其次，就旅遊活動的外在變化方面作探討，顯示清代旅遊消費的商品化現象較晚明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在許多技術層面並沒有革命性的突破。第三，從文化內在變遷的角度來分析，清人的遊記書寫與論述相較於明人，卻有截然不同的轉變。

雖然本專號諸文在表面上處理的，並不是結構性的大問題，但是各篇文章都從不同的角度觸及社會結構或文化結構的變遷。如王鴻泰的研究說明了明清「文人文化」的歷史經歷，這個過程大抵是透過詩歌養成「文人」，再經由「文藝社會」建構，進而促成文人文化的開展。邱仲麟的論文描繪出明清的北京，由於官方及民間所窖藏的冰塊甚多，在生活上均與官員及百姓發生不同程度的連繫，造成人們的生活發生變化：由於冰塊價格不貴，因此即使是平民也可以享用冰。王正華認為乾隆朝的城市圖形塑了蘇州「新」的地景，不再是十六世紀以來文人文化傳統的山光水色或人文色彩，而是商業繁榮與乾隆朝地方政府建設完善的政績，這也是帝國眼中太平盛世的象徵。從消費文化而言，賴惠敏的研究更形重要，她的文章充分說明了晚明在時尚創發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士大夫，到清代以後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領導流行時尚的推手轉移到宮廷。拙文嘗試由旅遊文化的角度，探討明清兩代的文化是否連續或是斷裂的問題，這涉及到「明型文化」與「清型文化」的轉變與差異。

此外，本專號中的各篇專論，也都注意到在社會生活中或隱或顯的政治權力。賴惠敏與王正華的文章最為明顯。賴惠敏指出乾隆皇帝的喜好，不但影響官員參與商業營運的契機，同時也影響蘇州等地區的消費行爲，我們看到江南社會的菁英家庭流行擺飾自鳴鐘、戴手錶、穿皮裘的時尚，這波風尚甚至影響到庶民的消費取向。王正華的論文中也可見政治權力與文化消費之間的互動與複雜的關係，她還特別指出乾隆城市圖像中的西洋畫法，即是政治意涵表現的一種載體，也是政治權力深入蘇州形象與地景塑造的方法。加入西洋因素的宮廷繪畫，不但彰顯大清王朝的帝國性質與傳統中國王朝不同，更具有意圖包含

所有且擴張性極強烈的政治特性。邱仲麟探討天然冰時也特別指出，北京的賜冰制度涉及到公共衛生的問題。清代在康熙末年還規定夏日須給予在京獄囚冰水，雍正 10 年(1732)更下令於北京的九個城門預備冰水提供行人飲用。後來，士紳也倣效此制，在大街上施捨冰水。作者強調：「此一措施不僅蘊含重要的公共福利意義，甚至也與公共衛生相牽涉。」王鴻泰也注意到明中葉以來科舉之途的坎坷，激發士人轉向詩歌寫作，以文藝為生命活動的重心，而全然認同「文人」之社會身分。拙文也指陳明清兩朝政權的轉移，與異族統治等「斷裂」的表象之下，並沒有完全阻礙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發展，然而這並不代表清中葉以後，士大夫的旅遊文化完全承繼了晚明的特色，因為兩者之間仍有許多的差異與變化。

我們也看到其中一些論文，很明顯地受到西方文化史的影響。過去認為歷史上有一個客觀的、先驗的實存想法，近年來逐漸被論述(discourse)、文本(text)、再現(representation)等觀念所取代，成為新的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論。王正華的研究即是利用圖像史料當作文本分析，探討地景的塑造與再現的象徵意義。拙文中也探討清人的遊記書寫與論述的轉變，和當時社會現實之間的落差。

「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的主題計畫在提出時，部份原因是受到布勞岱爾(Fernard Braudel)對日常生活的研究及所謂“total history”的觀念影響，覺得我們過去對明清社會的研究，還有不少需要補白的地方，但我們對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其他理論背景了解還不夠深入。雖然在計畫提出時，我們都希望針對一些過去不會被拿來當作嚴肅學術研究對象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卻不會對探討的課題作太多的限制，以致於這些新的研究成果還未完全形成一個非常緊密、集中的理論框架。這些都是未來仍需要進一步思考與整合的問題，冀望未來在明清社會文化史方面會有更新的突破。³

³ 有關該主題計畫的內容及其成果的介紹，參見李孝悌，〈明清的社會與生活：計畫簡介〉，《漢學研究通訊》，卷 20 期 2（2001 年 5 月），頁 54-57。